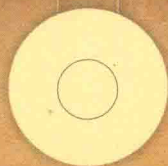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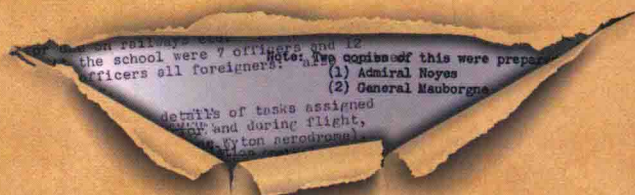
TOP SECRET



秘密战

1939-1945 年的 间谍、密码和游击队

[英] 马克斯·黑斯廷斯◎著 何卫宁◎译



THE SECRET WAR
SPIES, CODES AND GUERILLAS
1939-1945

新华出版社

秘密战

1939-1945 年的
间谍、密码和游击队

[英] 马克斯·黑斯廷斯◎著 何卫宁◎译

THE SECRET WAR
SPIES, CODES AND GUERRILLAS 1939-1945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战：1939—1945 年的间谍、密码和游击队 / (英) 马克斯·黑斯廷斯著；何卫宁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6

书名原文：THE SECRET WAR: SPIES, CODES AND GUERILLAS 1939—1945
ISBN 978-7-5166-3273-4

I. ①秘… II. ①马…②何… III. ①情报活动—史料—世界—1939—1945 IV. ①D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011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6498

THE SECRET WAR: SPIES, CODES AND GUERILLAS 1939—1945

Copyright © Max Hastings 2015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简体中文出版版权归新华出版社

秘密战：1939—1945 年的间谍、密码和游击队

作 者：[英] 马克斯·黑斯廷斯

责任编辑：张 敬

责任印制：廖成华

译 者：何卫宁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印 刷：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9

字 数：50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201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273-4

定 价：7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群特别奇妙的参战人员，本书就是讲他们的故事。战争中，步兵、水兵、航空兵、平民有着极为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操着不同的武器，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那些动手杀敌的人固然最惹人注目，但从许多角度看，他们也是趣味最少的：他们的战果深深地受制于一群从来不开枪的男男女女。即使在苏联，大战役之间也常休战几个月，但秘密战却一刻不停地继续着，秘密战的战士们想尽办法展开间谍活动，破译敌人的密码，获取有关敌人的知识，帮助自己的陆海空军能打胜仗。艾伯特·普劳恩（Albert Praun）中将是纳粹国防军最后一任通信兵的首长，他后来写道：“虽然大炮还没开始响，但现代‘冰冷的无线电波战’已经在各战线上展开了。”在轴心国占领区，只要条件合适，盟国也发动游击战和恐怖战，他们的秘密行动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本书不奢望面面俱到，那样几卷都写不完。本书的重点是交战双方发动秘密战的机构和这些机构中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本书很可能不会有突破性进展，因为有些秘密档案可能仍然被弗拉基米尔·普京锁着。日本人在1945年破坏了大部分情报档案，而残存的仍然在东京看不到。尽管如此，老兵在战后提供了重要的证词——十年前，我亲自采访过一些老兵。

大部分有关情报战的书只讲某个国家的情况。我想从全球角度讲。我写的一些情节，专家可能会觉得老生常谈，但把这些情节放在世界大局中去描写似乎是一个新角度。有关间谍和译码员的文献数量巨大，但读者可能会对我这本书中的某些故事感觉惊奇，因为这些故事是我独立研究的结果。西方读者比较熟悉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阿灵顿厅学堂（Arlington Hall）、美国海军作战部通信保密科（OP-20-G）的故事，所以我在他们比较不熟悉的苏联人身上用墨颇

多。我省略了许多故事，既不想复述西欧抵抗组织的故事，也不想复述德国反间谍机关阿勃维尔（Abwehr）在英国和美国的故事，因为德国间谍很快被“策反”，加入著名的“双十系统”（Double Cross system，英国管理双料间谍的系统）。不过，虽然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和间谍“西赛罗”^{*}的故事已经为人所知数十年了，但其重要性值得重新反思。

有些秘密战士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但也有铸成大错的。在我的叙述中，你会看到英国人几次丢失敏感资料，这对“超级机密”来说是致命威胁。另一方面，有些间谍战作家迷恋写“剑桥五杰”叛变的故事，但只有少数注意到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华盛顿和伯克利五百人”的群体——他们是美国的一小群左派人士，为苏联情报部门提供信息。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极为不公平地诬陷了许多人，但他在1930年至1950年之间的指控并没有错，那时在美国政府、美国最好的学府和企业内部有大量首先效忠其他国家的员工，其数目之大令人吃惊。在1941年至1945年之间，苏联人本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的盟友，但斯大林不停地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临时与苏联的历史宿敌形成的联合，目的仅是为了消灭纳粹。

许多关于情报战的书的重点是讲间谍和译码员发现了什么，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发现的秘密怎样改变了战局。苏联间谍队伍的规模比其他交战国的大了许多，并充分利用了从英美那里获得的丰厚技术资源，但斯大林疑心太重，浪费了搜集到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秘密。2014年，美国最杰出的战时密码史学家对我说，他在花费了半辈子研究这个主题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盟国的情报工作对赢得战争几乎没有任何贡献。这个结论似乎是太过极端了，但我朋友的评论说明了一点，在这个间谍头目和间谍摸爬滚打的沼泽地中充满了虚构、叛变、无能，衍生出大量怀疑的论点，或者说表面是怀疑的论点，其实是蔑视的论点。从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出，官方的保密措施，在帮助情报机构逃避国内追责方面作用比较大，在防范敌人渗透方面作用反而比较小。例如，军情六局^{**}的最高机密被自己的高官金·费尔比（Kim Philby）泄露给苏联长达几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让英国公众知道自己的情报机构首长的姓名，这样的保密有何种意义呢？美国政府拒绝接受战略情报局的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少将与

* 本书中间谍的代号用引号标出。

** 英国的军情六局（MI6）还有另一个常用的名字 SIS——秘密情报处。本书只用军情六局这个名字，即使在引用文献时，也这样用，目的是为了与美国的通信情报处 SIS（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混淆。

苏联内务部* 达成的情报交换协议，但美国官方的谨慎对国家安全的帮助并不大，因为多诺万手下的关键性人物正在把机密信息传递给苏联间谍。

搜集情报不是科学。情报不是真理，即使你看到敌人写的信，那信也可能是假的。信号隐藏在噪音中，真实的情报，无论大小，必须从噪音中提取出来。1939年8月，在德国和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夕，一名英国官员双手焦虑地抓着一份有关柏林和莫斯科关系的情报，面对这份令他感到迷惑的情报，他写道：“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情报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手里拿着秘密报告，却很难判断其价值，就如同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中门上的白色记号一样，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孤立地研究某个国家的经验教训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在研究了摆放在分析员、政治家、指挥官桌子上数千页的烦琐文件之后，才有可能看清来龙去脉。“根据我的经验，记者是骗子，而外交官和间谍是大骗子。”二战中的英国间谍马尔科姆·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写道。他很熟悉这三类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骗子。许多谍报工作都没有什么用处，这点可以从捷克情报官弗朗蒂舍克·莫拉韦茨（Frantisek Moravec）的一次经历看出来。1936年的一天，他向上司提交了一份德国新武器的报告，为获得这份报告，他付给情报员一大笔钱。上司把报告丢在一旁，说：“我让你看点更好的东西。”上司在一堆德国国防军的杂志中翻出一本，指出一篇谈论相同武器的文章，冰冷地说：“订这份杂志只需要20克朗。”

阿勃维尔也遇到过类似的事。1944年12月，阿勃维尔获得了美国国务院发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有了一位新的经济顾问。这份电报中有这样的内容：“他的交通费和日津贴，从突尼斯至伦敦，途经华盛顿，他家庭的交通费和日津贴、行李托运费，都根据旅行法规获得了批准。”这份被盖上了“绝密”图章的密电码电报足有1页长，德国人需要破译这封电报才能读懂。为了破译这块宝贝，德国的战争机器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件事反映了情报工作的性质，有时搜遍一座山就为了捉一只老鼠。

信用是自由社会的契约和特权。轻信和保密意识是情报工作的大敌。间谍需

* 即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内外都有分支机构。这个机构在1934至1954年间不断改组，最后变成克格勃。在本书中统称为“内务部”。1943年之后，苏联还有一个反间谍组织叫“锄奸队”。同时存在的还有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格勒乌”，格勒乌始建于1926年，在苏联内外与内务部有激烈的竞争。

要说服其他国家的公民放弃传统的爱国主义，这可以是靠给现金，也可以靠信念，也有时可以靠密告者和听密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在这个领域里充满了争议。那些出卖国家秘密的人是勇敢的、守原则的、具有更高道德标准的英雄吗？比如，现代德国人就是这样看反纳粹的抵抗组织的。但我们应该把金·费尔比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放在哪一类里呢？我们这个时代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又该如何分类呢？情报官的日常工作就是鼓励叛变，这解释了为什么情报界吸引来了这么多怪人。马尔科姆·蒙格瑞奇曾轻蔑地说：“做情报工作必须去欺骗，去撒谎，去叛变。做情报工作损害人格。我遇到的情报人员，没有一个是值得信赖的。”

斯大林曾经说：“间谍跟魔鬼一样，没有人相信他们，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由于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主义，一些人突破国界表示忠诚，其狂热程度超过了爱国主义。没有多少人因叛国而感到兴奋，许多人是为了金钱。在战争年代，间谍组织的头目无法判断手下的间谍到底在为哪一方工作，有些案例到了今天仍然含糊不清。英国小骗子埃迪·查普曼（Eddie Chapman），代号“锯齿”，在与英国和德国的周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有许多次英德双方都想要了他的性命，但似乎他的活动对双方也没有什么好处，查普曼为活着只能沉醉于女孩和军人的大皮靴之间。他是个不重要的阴谋家，是秘密战中天马行空的人。罗纳德·赛斯（Ronald Seth）的故事很有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英国特别行动局（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的特工，被德国逮捕后，受训成为一名英国“双料”间谍。我在后面要描述特别行动局、军情五局、军情六局、军情九局、阿勃维尔的困惑，他们搞不清赛斯到底效忠谁。

搜集情报存在浪费现象。我吃惊地发现各国都有大量平庸的情报官，他们唯一的业绩就是在国外的岗位上混日子，消耗了雇主大量的钱财，搜集到的情报对打仗几乎没有帮助。在二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恐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情报对战争结果有帮助。然而，就是为了这么一点有用的情报，战争领袖不仅不吝惜钱，而且还不吝惜生命。情报永远对战争有影响，但在20世纪之前，指挥官只能靠间谍或观测才能知道敌人的行踪——多少人、多少船、多少炮。此后，有了无线通信，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到了20世纪30年代，情报工作出现了大繁荣期。“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无线电发挥如此大作用的时期，”英国伟大的科学情报军官琼斯（R. V. Jones）博士写道，“……是至今为止物理学最富于想象力发展的结果，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魔术。”世界上除了有数百万人在家里玩无线电装置，许多外国间谍都有自己的无线电装置之外，在柏林、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东

京，电子窃听者有能力在没有望远镜、帆船、间谍的协助下，就能探听到敌人的部署，有时还能探听到敌人的战略意图。

本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盟国并非像民间传说的那样重视信号情报，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德国人利用情报很好地策划了1940年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军事行动。至少是在1942年年中前，甚至稍后一点，他们破译了盟国在陆地和海上的通信密码，对大西洋之战和北非之战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人在“巴巴罗萨”行动的第一个年头里就发现了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有弱点可以利用。但1942年后，希特勒的译码员落后于盟国的同行。阿勃维尔向海外派遣间谍的尝试令人鄙视。

在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政府和军队高层在策划对珍珠港、南亚欧洲殖民地发动初始攻击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但之后轻视了情报工作，在对敌人行动一无所知的迷雾中打仗。意大利的情报机构和译码员，在战争初期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功，但到了1942年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军官只能利用苏联战俘偷听苏联的无线通信通话。相对来说，很少有人花精力刺探意大利的秘密，因为其军事实力萎缩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们有关意大利空军的情报很不完整，很难说可靠，”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官哈里·汉弗莱斯（Harry Humphreys）上校针对地中海的战局说，然后又自鸣得意地补充了一句，“但我们很幸运，敌人是意大利空军。”

秘密数据，要想成功地加以利用，有个首要条件，那就是指挥官必须愿意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赫伯特·麦尔（Herbert Meyer）是华盛顿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老专家，他说自己的任务就是展示“条理清晰的信息”；他主张情报部门应该像船或飞机上的导航系统一样为指挥官提供服务。唐纳德·麦克拉克伦（Donald McLachlan）在英国海军做过情报工作，他评述道：“搞情报很像做学问，情报官应该以学者做榜样。”战后，活下来的德军指挥官把德军情报的失误全归罪于希特勒不能客观地评价情报。德军通信兵首长艾伯特·普劳恩说：“很不幸……在整个战争期间，希特勒显示出对通信情报缺乏信任，特别是当情报与他的观点相反的时候。”

对轴心国有利的消息——比如，截获的情报表明盟国损失惨重——这样的情报被优先发往柏林，因为元首喜欢这样的情报。相反，坏消息没被理睬。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前，德国经济和军备局（WiRuAmt）的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将军对苏联的武器生产做了一番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尽管仍然低估了苏联，但他指出苏联即便失去了欧洲部分的领土，也不等于斯大

林丧失了工业基地。希特勒马上表示不同意托马斯的估计，因为这份估计中的数字无法与希特勒对斯拉夫人的蔑视保持一致。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Keitel）后来指示经济和军备局停止提交情报，免得惹恼元首。

西方民主社会治理比较开放，这给打仗带来了好处。丘吉尔经常对他身旁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大发雷霆，但盟国权力机构允许大胆的争论，在各大军事总部里也允许。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是个大暴君，但他允许几个亲信自由地表达意见，其中包括他的情报官比尔·威廉姆斯（Bill Williams）准将，此人后来成了牛津大学的教授。美国情报界所取得的大成就，都是通过密码破译获得的，这些情报在太平洋海战中被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应用。美军地面部队指挥官对利用情报进行欺诈的兴趣不大，这点跟英国人不一样。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只有一次真心地参与了欺诈行动，它就是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即便如此，英国人是始作俑者，美国人也只是同谋——例如，美国允许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假装是虚设的美国第1集团军的指挥官，虚张声势让这支军队在加来登陆。一些美军高官对英国人的热情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英国盟友如此热情搞欺诈，是为了逃避战争中必不可少的艰苦战斗。

所谓的英国政府密码学院（Government Code and Cipher School, GC&CS）坐落在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这里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中心，而且从1942年起对战争的胜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民间传说艾伦·图灵（Alan Turing）创造出能破译德国恩尼格玛（Enigma）密码电报流的机电装置，使德国通信体系置于盟军的眼皮底下。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多了。德国人使用十几种密钥，许多密钥很难完整地破译，密码电报经常不能“及时”破译出来——来不及供调整战场安排之用——有几个密钥根本破译不了。英国人破译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恩尼格玛密文，但很难说做到了全面破译，德国陆军的密文被破译得特别少。此外，德国人把最机密的电文用电传打字机构成的网络进行传递，而且传送量逐渐增加。电传打字机使用了与恩尼格玛密码机截然不同的洛仑兹（Lorenz）的加密系统，这套加密系统被布莱切利园的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破译了。虽然破译电传打字机比破译恩尼格玛密码机更难，但人们一般把布莱切利园的破译成果统称为“超级机密”。* 比尔·图特（Bill Tutte）是一位年轻的剑桥大学数学家，

* 美国人称他们破译日本人的密码为“奇迹”，但本书把布莱切利园的破译结果称为“超级机密”，这个称呼已经被大西洋两岸所接受。虽然布莱切利园破译了敌人高级的密码和编码，但奇怪的是在布莱切利园，极少有人用这种称呼。

他发现破译洛仑兹密码的关键线索，但后世几乎不知道他，他本应该与图灵一样有名。

在战争的后半期，“超级机密”使盟军领袖充满信心地策划战役和军事行动，历史上没有任何军事领袖曾有过这样的待遇。虽然知道了敌人的计划，但不等于削弱敌人的实力。在1941年和1942年初，英国人多次知道了轴心国的进攻企图——比如在克里特岛、北非、马来亚——但他们还是照样失败了。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海上，或是空中，军事硬实力必须辅以秘密情报。同样，在1944—1945年欧洲西北部战场上，英美的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官明显缺乏智慧。但情报在防患于未然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年轻的琼斯成功地找到了阻止德国空军导航波束的方法，这有效地减轻了德国的“闪电战”给英国带来的痛苦。在海上，“超级机密”给出德国潜艇的精确方位，这使护航商船队能避开德国潜艇，并在维护大西洋海上运输线和击沉敌人潜艇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不过，“超级机密”在1942年令人吃惊地暂停了9个月。

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盟友对战术欺诈太上心，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达德利·克拉克（Dudley Clarke）上校，他在西班牙警察中间很有名气，因为他曾经穿着女式服装出现在马德里街上，并因此被警察逮捕。就是此人在1942年阿里曼战役中进行了大规模的伪装战。历史学家赞扬了克拉克的聪明才智，因为他创造出来一支假部队，使隆美尔在蒙哥马利主攻阵地的南面部署了大量兵力。然而，为了打败德国非洲军团，即使用了如此诡计，英国第8集团军仍然进行了两星期的艰苦战斗。德国人争辩说，克拉克的活动对战役结果没有帮助，因为他们有时间在英国人发动总攻前完成再部署。在缅甸，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上校（他的兄弟创造出了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冒着危险，深入敌后，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留下一辆破旧吉普车，车上放着一个装满了假“秘密文件”帆布背包，但日本人拿到帆布背包后，没有注意到里面还有东西。1942年后，英国情报部门完全能破译德国空军的情报了，理解了德国所用的电子技术，但盟军的轰炸机仍然遭受了惩罚性的损失，这种情况一直等到美国的远程战斗机在1944年春季打败德国空军之后才有改观。

无论英国人在北非的战术欺骗有何效果，盟军的谋略家还是取得了两次重要的、无可争辩的战略胜利。在1943—1944年间，“齐柏林”行动虚拟了一支英国部队驻扎埃及，这使希特勒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保留下大批兵力，防止盟军在巴尔干登陆。就是这个虚拟的威胁使轴心有22个师的兵力滞留在东南战场，直到诺曼底登陆后才掉头返回，在这方面铁托（Tito）的游击队其实没有发挥什么作

用。第二个成就是“坚韧”行动，这次行动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和之后展开。但有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如果盟军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没有制海权，给人一种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登陆的假象，这两个行动成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苏联人的战术欺诈比英美的要高明多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一个代号“马克思”的间谍的故事西方读者并不知道，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了一次巨大的佯攻，损失 7 万条苏联人的性命，是二战中最令人惊悚的事。1943—1944 年间，苏联在红军发动主攻之前，用诡计使德军把兵力集中在错误的地方。空中优势是必要条件，在东线和西线都是一样：在二战后期，盟军之所以能展开欺骗战术，是因为德国无法进行空中侦察，只能相信盟军通过无线电送给他们的假情报。

盟国在利用人工情报*方面不是很成功。英国和美国在德意日政府中都没有找到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到了 1943 年，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才接收到一些柏林传来的有价值的秘闻。盟国在这方面的成绩比不上苏联，他们渗透入了伦敦、华盛顿、柏林、东京。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是苏联间谍。美国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才开始向海外派遣间谍。在敌人的领土上，美国的重点是搞破坏和破译密码，而不是向敌占区派遣间谍，更不用说派遣准军事组织了。在华盛顿，战略情报局设立了一个研究分析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而战略情报局在情报场上的表现既浮夸，又没有重点。此外，我认为西方盟国资助的游击战更多地是在提升被占领土国家的人民的自尊，而不是加速纳粹的破灭。苏联人的游击战野心很大，英国的特别行动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比不上他们。苏联人的宣传攻势夸大了他们的成绩，他们在二战中和二战后都夸大其词。如今，有些苏联时期的档案可以查阅了，我的俄语研究员柳芭·维诺格拉多夫那（Lyuba Vinogradovna）博士进行了广泛的查阅。查阅的结果表明，我们应该对东欧的游击战成绩保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至少在 1943 年之前是如此。

我的书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用细节故事编织出一个“大框架”。我的这本书不仅包括间谍和译码员的故事，还包括为领袖们服务的情报官的故事——布莱切利园的图灵、太平洋战场尼米兹的密码分析员、苏联在德国的特务组织“红色管弦乐队”、德国陆军总司令部（OKH）的赖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

* “人工情报”指的是间谍搜集到的情报，“信号情报”指的是拦截无线电信号获得的情报。

战略情报局的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等更富于异国情调的角色。西方情报工作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就在于放手让平民去做，英国和美国政府相信他们的判断，给予他们影响力，如果有必要，就授予他们军阶，而敌人做不到这点。当英国官方《战争情报史》的第一卷出版的时候，我向第一作者、布莱切利园的老战士哈里·辛斯利（Harry Hinsley）提出了一个看法。在我看来，业余人士对情报工作的贡献比情报专家要大。辛斯利不耐烦地做了回答：“当然，他们的贡献大一些。你干吗让英国最聪明的人在和平时期把才智浪费在情报工作上？”

我一直认为这个观点很重要。这个观点在另一位学者的作品中也能找到，此人就是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他曾为英国的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都工作过，他的个人成就极高，似乎是英国战时情报工作的明星之一。在和平时期，情报工作不难做，只要不出大错，都算完成任务，所以情报机构里平庸的人很多。一旦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开始了，情报工作就变成了战争活动的大脑。战场上的战士不需要很高的智力，但需要运动场上的素质——体质、勇气、刚毅，有一点主动性和判断力就行。但这时情报机构就必须进有才华的人了。招募人要招募有才华的，这个要求听上去很迂腐，但有不少 20 世纪的故事说明，许多国家做不到这点。

这本书的布局我有几句要说：我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避免不停地在华盛顿的叛徒、苏联的瑞士的间谍、布莱切利园的数学家之间做切换，使读者感到混乱，但有些专题则没有按时间顺序写。我充分利用了这个领域的最权威的作者，包括斯蒂芬·布迪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大卫·卡恩（David Kahn）、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他们是我引用作者中比较有名的。我还利用了英国、德国、美国的档案，包括未翻译成英文的苏联材料。我不想讨论破译密码的数学问题，有在这方面比我写得多的作者。

人们常说伊恩·佛莱明（Ian Fleming）的惊险故事与现实中的间谍毫无关系。然而，我阅读了苏联当时的报告和谈话记录，以及莫斯科战时情报官的回忆录，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内容奇怪地反映在佛莱明的《来自苏联的爱》中的那些疯狂的虚幻对话中了。苏联内务部和格勒乌策划的某些行动，其古怪程度超过了佛莱明的故事。

历史故事有不确定性，当有间谍牵扯进来时，就更加如此了。在描述战役的时候，你能记录下多少船被击沉了，多少架飞机被击落，多少人被杀，占领了多少土地或丢失了多少。但情报是大量不可靠的文字，有些是敌人为炫耀和庆功而

写的。1975年出版的《谎言做保镖》是一部很流行的作品，但内容基本上是虚构的。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爵士是加拿大驻纽约的情报联络官，他的联络工作很有价值，但不是一个间谍网的头目。但这不妨碍他在1976年出版了一部相当充满幻想的自传《拥有无畏名誉的人》，其实根本没有人那样称呼他。英国特别行动局在法国特工的故事充满了浪漫的废话，特别是那些女特工的故事。莫斯科的撒谎癖从来就没有衰减的时候：克格勃的官方情报史，最近一次出版是在1997年，它断言英国外交部仍然藏着英国与“法西斯”德国秘密谈判的文件，这说明英国和希特勒是同谋。

盟国对德意日展开的密码破译工作产生的影响力远比任何间谍所做工作的影响力都要大。虽然无法量化密码破译工作的影响，但官方史学家哈里·辛斯利的断言让人感到困惑，他说密码破译工作让战争缩短了3年。富特（M. R. D. Foot）也同样偏颇，他在为特别行动局的法国行动写官方历史时声称，盟军领袖认为法国的抵抗活动使二战缩短了6个月。“超级机密”是英国和美国工具，在消灭纳粹的过程中发挥辅助性作用，而消灭纳粹的工作大部分是苏联军队完成的。同理，不能断言布莱切利园对战争时间的贡献比丘吉尔、自由轮（二战期间在美国大量制造的货轮）、雷达的贡献更大。

同样，有些煽情的现代书讲述“改变二战的间谍故事”，为这些书做宣传的人确实是在传播神话。丘吉尔曾经做出过大量评论，最深刻的一句是他在1941年10月说的，当时英国空军的首长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爵士要求制造4000架重型轰炸机，这位空军首长宣称这样能在6个月压服德国。英国首相回信写道：“确实可能制造这么多架轰炸机，但不能把夺取胜利的希望都寄托在一种手段上。”“世界瞬息万变。”丘吉尔严肃地说道。丘吉尔的这句话，对人类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对战争，但对情报工作有格外大的意义。胜负都不能归咎于某一个因素。

不过，人们对秘密世界有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但好奇的能力也需要有：有些惊人的传说是真实的。我羞于谈及1974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受一份报纸的邀请，为温特伯森（F. W. Winterbotham）的《超级机密》写书评。我在1939—1945年时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学生，不通世故，从来没有听说过布莱切利园。我翻了翻那本即将出版的书，谢绝为之写书评：因为温特伯森说的故事，我不敢相信是真的。然而，温特伯森是军情六局的情报官，是获准才为二战中最大且最奇妙的秘密打开一扇窗户的。

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出版一部大部头的官方战争情报史，总共分

5卷，3000多页，在1978—1990年间出齐。用纳税人的钱，如此奢侈地编写那段时间的历史，反映了英国人对自己成就的骄傲心理，这种骄傲心理一直维持到了21世纪，而且荒谬之极，竟然达到了漠视事实的地步，还拍出一部大获成功的电影《模仿游戏》。虽然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都知道英国对二战胜利的贡献不如苏联和美国，但他们意识到丘吉尔那帮人在某些领域确实比其他人厉害。这本书谈到许多情报工作的愚蠢和失误，但战争的胜利属于犯错比较少的那一方。基于这种考虑，英国和美国打赢了情报战，就如同打赢了陆地战、海战、空战一样。最关键的事实是盟国赢了。

最后，虽然这本书里包含了许多有趣的细节，但战争是生死的搏斗。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人为搜集情报或打游击战甘愿冒生命危险，许多人甚至牺牲了，这些人经常是一枪还未开，就在黎明前孤独地死去了。虽然我们可以用21世纪的视角去评判当时的人和事、胜和败，但我们绝对不能减少对那些为秘密战献出生命的人的尊敬。

马克斯·黑斯廷斯

2015年6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洪水到来之前	1
追求真相	1
英国人：绅士和玩家	7
苏联：间谍的神殿	15
第 2 章 暴风雨来临	34
“虚幻的洪水”	34
追踪卡纳里斯	46
第 3 章 迟到的奇迹：布莱切利园	55
“秘密消息”	55
挑动美国人	77
第 4 章 咆哮的狗	83
“露西”间谍网	83
佐尔格的警告	89
管弦乐队	92
克里姆林宫的聋子	99
第 5 章 神风	109
弗格森夫人的茶具	109
日本人	113
赢得中途岛的人	124

第 6 章 混乱中摸索：战争中的苏联人	138
莫斯科情报中央的动员令	138
佐尔格的结局	142
第二情报源	145
古勒维奇掌权	148
第 7 章 英国的秘密战争机器	155
尖端	155
大脑	159
海上	169
第 8 章 火星行动：最血腥的欺诈	178
盖伦	178
代号“马克思”的间谍	182
第 9 章 红色管弦乐队的最后表演	191
第 10 章 游击队	202
抵抗者和袭击者	202
英国特别行动局	207
第 11 章 胡佛的调查员，多诺万的野人	224
冒险	224
象牙塔	237
艾伦·杜勒斯：跟德国人交谈	243
第 12 章 苏联游击队：恐怖的对立面	251
第 13 章 暴风雨中的岛屿	262
阿勃维尔的爱尔兰舞曲	262
无人之地	269

第 14 章 不帮忙的朋友	278
“虽然臭但总得有人去做”	278
美国的叛徒	294
第 15 章 知识工厂	311
特工	311
宝石般的情报源	317
生产线	323
可憎的机器	335
第 16 章 “笨头笨脑”：英国病人	345
第 17 章 阿勃维尔的衰落	357
希特勒的布莱切利园	357
“西塞罗”	368
幻想曲作曲家	371
“好心的”纳粹	378
第 18 章 战场	387
挥舞超级机密的大棒	387
间谍自杀	393
有污点的凯旋	398
第 19 章 黑衣寡妇和白衣骑士	404
与日本作战	404
内斗	411
躲在黑暗中的敌人	415
第 20 章 “巨大”	420
第 21 章 对胜利的解析	430